

中国共产党对构建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系统的探索与实践

李守可

(南通航运学院 社科部, 江苏 南通 226010)

摘要:从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理论的视角去回顾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发展历程具有理论、实践和方法上的重要意义,可以衍生出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思路和新范畴。中国传统社会在封闭系统中的运行导致了周期性的治乱循环,社会秩序呈现出稳定与动乱之间的单一替代规律,这一规律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根源,是社会系统的封闭性、社会结构的固定性、新的异质性因素发展空间受限及传统文化的桎梏等导致的结果。而要打破这一规律,必须构建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系统。中国共产党在 90 多年的发展实践中,一直在为跳出传统社会的历史周期律,构建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系统而进行艰辛地探索,前后经历了四个时期的摸索、初建、调整与变革,在理论认识上不断深化,在实践推行中不断修正。虽然在此过程中经历过各种曲折、教训和偏差,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建构起了符合中国国情、顺应社会发展、求解民众需求的社会良性系统,解决了中国社会良性运行的主要障碍。当前,中国共产党超越了传统社会周期循环的历史魔咒,已经将当代中国社会基本导入了社会良性运行的轨道,但依然面临着种种挑战和困难,需要其遵循社会运行规律,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真正的将国家治理现代化、依法治国和“四个全面”等最新的理论成果付诸实践,既着眼于社会良性运行的宏观视野,又高度关注影响社会良性运行的中观与微观构成要素的风险性,继续为全面构建中国社会良性运行、稳步发展、长治久安和谐共生而努力。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社会运行;社会良性运行;社会治理;社会系统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580(2015)02-0021-16

本文试图借鉴社会运行系统理论的有关知识,将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的发展历史置于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的宏观视野中进行线式考察与分析,重新梳理与挖掘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活动,提炼出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虽然经历过艰难,但实际一直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ZA710079)

作者简介:李守可,硕士,讲师(E-mail:chengshigudu@tom.com)

在为跳出历史周期律,建构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系统目标的愿景而努力。从当代社会良性运行理论的视角去回顾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发展历程,具有多个层面上的意义。理论上,能够进一步拓展从唯物史观、社会现代化视角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思想,为中共党史研究从当前比较盛行的社会运行学中汲取营养,建构新的理论研究范畴提供新的研究景象。且社会运行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其理论来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整体”思想和“社会系统”原理,更关注的是社会发展的宏观视野及其内外部的相互关系,在理论的对接上,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对社会发展的探索与理解具有适切性。实践上,从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系统的视角分析与解读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实践,对于深入理解中共发展过程,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并为当代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社会学依据,为在当代中共领导全国人民建构更贴近中国国情的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系统提供历史借鉴。方法上,透视一个政党对社会运行的觉察与掌控能力,必须要具有理论思维、历史思维和现实思维,对于中国这样在现代化道路上探索时间不长、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大国来说,政党的执政理论和对社会运行理论的熟悉程度,对我国呈现出何种社会运行状态至关重要。因此,在方法上,必须要具有系统观、整体观,既要纵向梳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运行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和功能,又要在横向上关注各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

一、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系统及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周期律

(一)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系统

学术界对于社会系统运行规律的认知有不同的学科视角,随着各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于社会系统的运行规律认知也越来越清晰。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崇尚将社会诸影响因素纳入到一个系统进行研究与解释,尤其是注意社会系统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则从生态学的角度将社会视同为一个有机体,社会的运行与人体一样,依赖于营养、循环(分配)和神经(调节)三个系统,且系统间只有各司其职、互相协调,社会运行才能处于良性和均衡状态。我国社会运行理论的创始者是著名社会学者郑杭生先生,以他为核心的社会运行学派从世界视野、中国国情出发,采用理论建构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在“社会运行论”的总框架下,提出了“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学科本土化”等概念和体系,对更加清晰的认识中国社会运行的规律,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行存在的问题与困境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当前,从社会运行视角考察与分析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功能和作用,学界还探讨得较少,更多的学者是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谐社会构建等领域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职责、功能进行研究,在研究的范式上,还未形成系统体系和权威话语。

总体上来说,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但又有律可循的社会运行系统,社会系统的整体质和系统质不等于各要素相加之总和,也就是说,不是“1+1=2”的简单累积,而是一个呈现因素叠加效应和发展非线性的系统,它的整体性以社会关系的总和为基本内容,它的有序或优化过程,以物质生产为基础性等级和根本层次,开放式地排列和演进,并遵循从无序向有序、从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从低级系统向高级系统演化的规律,这需要敏锐洞察和系统分析。因此,

从系统论的宏观视野去分析与理解社会的运行和发展,才能逐渐理清社会运行的规律,掌握社会运行的发展趋势。

社会运行是指社会有机体自身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表现为社会多种要素和多层次子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它们多方面功能的发挥^[1]。在运行方式上大体可以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纵向运行是指社会的历史发展与变迁,其呈现的一些基本关系有继承、变异、中断等;横向运行是指在社会发展某一阶段上社会诸要素、诸系统的交互作用,呈现的基本关系有交叉与渗透、制约、促进、转化等。社会运行和发展大体可分为三种状况,即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分别体现为协调发展、模糊发展和畸形发展。而社会良性运行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高度适应,是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理想模式。具体而言,是指特定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之间,社会各个系统之间(包括社会系统与外部系统的交换)以及系统的不同部分、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协调与相互促进,社会障碍、失调等因素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最小的范围之内^[1]。一个良性的社会运行系统,必然具有开放性,系统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能够保持物质、能量与信息的输入与输出,系统内部各结构要素活力迸发,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有序上升。一个良性的社会运行系统必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社会分工与合作高度发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呈现非线性式发展,相互之间不可分割又相互制约;一个良性的社会运行系统又必然具有动态有序性,社会在诸因素相互作用下向上演变,社会从无序向有序、从低级向高级演化;一个良性运行的社会系统必然具有自我创新性,社会创新要素始终保持着饱满状态,社会运行的轨迹不会被一些偶然因素左右,发展的向上可预见具有不可逆性。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所指出的:“现代社会的各种政策、制度、规范和价值等,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完整系统,要建立一个良性运行的社会,就必须全面考虑在各种社会运行机制之间形成一种和谐的安排。”^[2]

社会运行状态由于受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可能是单一性的,也可能是三种状态相互交织的,其大致的方向是以一种社会运行状态为主,其他运行状态以区域性或社会要素为特征。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周期性的治乱循环为主要特征,中国近代社会是以总体恶性运行并以阶段性与区域性社会中性运行为主要特征,而建国后的中国社会在经历了短暂的曲折后逐步走上了良性运行的轨道。

(二)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周期律及其原因

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呈现了鲜明的王朝更替、政权换手和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周期现象。社会系统的更替往往是在重建、治乱、稳定、衰败、没落的一次次简单重复,每一个王朝的结局都是在社会矛盾积重难返的情况下被暴力运动所推翻。这种周期性的治与乱,突出表现为社会运行基本上处于无序与有序的低水平循环和来回游荡,特定王朝的某一个阶段可能社会系统会发生一些因素上的变化,但在没有新质社会出现的情况下,这些变化也只能是昙花一现。中国传统社会周期性循环的根源在于社会系统的封闭性、社会结构的固定性与不可调和性、新的异质性因素发展空间受限及传统文化的桎梏。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

1. 经济根源。落后的生产方式造就的生产低下及地主土地所有制导致人民的极端贫困。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为基本劳动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从诞生之日起,从来没有被动摇过、中

断过和破坏过。简单落后的生产方式造就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封闭性,并成为其稳固的基础。这种自给自足的以手工劳作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在封建王朝以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盘剥及每个王朝后期沉重的税赋压力之下,变得异常脆弱,加上传统社会低下的生产技术能力所造成的人口增长与物质生产的比例失调,使得农民与城市小市民生活需求和水准长期维系在最低水平线上。因此,传统社会中下层的民众在极端贫困与生存的重压之下,纷纷采取武装起义的方式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这构成了每一个王朝没落的必经阶段,也是传统社会周期性治乱循环的根本原因。

2. 政治根源。民权无法与君主专制博弈及官僚政治所导致的权力滥用和腐败。中国传统社会实行家天下和君主专制世袭的政治制度,君主把持着国家的发展动向,是绝对的掌控者和独裁者,其个人的权力不受控,存在着权力滥用和家长制作风,缺乏起码的制约、监督和平衡,人民的基本人权毫无保障。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使得垂直的各级官僚系统只能是君主专制的附属,只有听命和服从的义务,而无抗辩、制约的权力。政治学的基本常识是权力绝对集中与失衡必须导致权力寻租和大面积腐败,中国历代王朝尤其是在王朝后期,腐败如癌症一般附着于社会的上层各级官僚机构,最后基本上都是以官民矛盾不可调和、官逼民反、王朝更替的结局收场。

3. 社会根源。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和宗法制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严重不公。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和鲜明的宗法制维系特征,整个社会呈现固化阶级结构,它限制垂直流动在任何阶级、阶层间自由发生。如贵族以血亲和特殊功勋形成世袭的特权等级,不轻易允许较低级阶层向贵族流动,贱民的上升流动也从法律上加以限制^①,社会流动缓慢,仅留下军功和科举制进行流动的狭小空间。中国传统社会以政治权力为社会行政组织和管理体制核心的现实又必然要求要以官本位制作为国家的基石和支柱,官本位制与宗法家族制又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和极权制。这种高度集权统治下的皇室、官僚及大地主阶级拥有统治的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力,并利用这些权力为自身谋取各种利益。同时还利用制定法律体系、建设国家机器、垄断意识形态等方式维护与保障其既得利益。然而,在传统社会经济十分落后、物质产品长期匮乏、社会保障体系式微及民权缺位的现实下,社会资源不断地向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倾斜,当达到社会承载的限度和民众不可接受的界点时,王朝即被为争取基本生存权力的民众以揭竿而起的方式所颠覆,社会进入全面的失序期。整个传统社会的周期复始,基本上都是以残酷而血腥的战争方式解决不断出现的社会系统严重失衡问题,社会系统也在“无序→有序→无序→有序”往复中不断被冲击、重建。

4. 文化根源。家庭伦理秩序文化和儒家传统导致政权认知的合理性与激进变革的非法性。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家庭本位、农村导向的半封闭性宗法社会,其特征是血缘家族本位、父家长制、众子均分继续制、祖先崇拜、重视传宗接代、个人价值受到贬抑。家庭本位制使群体压制个体、群众扼杀个体成为根深蒂固的文化意识、生活准则和道德规范,个人不得对权威或长辈持怀疑或否定态度,个人无法跳出家族的窠臼。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家庭伦理秩序文化的理论诠释及国家应用,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统社会“唯我独尊”并长期占据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本质上是因其符合统治阶级的需求和社会结构的需要。

但总体上来说,其是一种崇奉传统而反对激进变革的保守温和的意识形态。长期经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民众,一直以来都是处于遵从并受制的地位,很难在意识上突破自我,更谈不上提出变革生产关系或进行社会改革的激进观点,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中国传统社会只有累积性的渐变,没有飞跃性的突变。正如王亚南先生所指出的:“惟其中国专制的官僚的政治自始就动员了或利用了各种社会文化的因素以扩大其影响,故官僚政治的支配的、贯彻的作用,就逐渐把它自己造成一种思想上、生活上的天罗地网,使全体生息在这种政治局面下的官吏与人民,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都不知不觉地把这种政治形态看为最自然最合理的政治形态。”^[4]

中国传统社会周期变更循环历史的一再重演,其原因还包括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小、外来势力的入侵、地广人多导致国家机器维持社会秩序的难度大和成本高、重农抑商政策所导致的经济发展低水平重复等等。社会结构构成要素不是自由成长,而是处于庞大的专制和官僚体系的控制之下,社会缺乏必要的活力,星星点点的异质新因素往往刚一出现即被扼杀在摇篮中,以致无法像欧洲资本主义经济逐渐成长与积累并取代封建经济那样,被迫长期在中世纪的困囿中徘徊。这种状态在近代被外力撕开了裂口,重复循环的社会运行被导向了另一个发散式的轨道,中国社会一度出现了朝向各种社会运行的可能性,而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挟裹的社会运行中逐渐成长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强有力执政能力的执政党,解决了中国社会一再陷入循环的主要危机,逐渐寻找到了跳出传统社会的历史周期律并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运行之路。

二、中国共产党构建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系统的艰难探索和曲折实践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发展四个时期。在这四个时期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为构建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系统而进行着不懈地努力与奋斗。由于全面把握社会运行规律与运行系统有一定难度,尤其是对于中国这种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新民主主义社会并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特殊社会性质变迁,跳过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原始积累,在探索与应用社会运行系统时,不同阶段出现了挫折与失败,甚至一度出现社会失序和混乱的局面。但从历史演变的规律看,正是这些曲折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为今天更加清醒地认识社会运行规律,建构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运行系统,进而将中国导入现代社会的良性运行机制之中提供了历史借鉴。

(一)解除束缚: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无序状态,为中国建构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系统奠定了基础

近代以来,在西方殖民势力的强力入侵下,中国社会被卷入了世界发展的大潮,从根本上打破了自身的王朝循环的“内圈”,开启了从传统向现代、从农业向工业转化的大幕。总体上来看,近代中国革命经历了自身衰败的过程、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的过程、革命化的过程和现代化的过程,其分别代表着王朝各种内部体制性危机和社会骚扰的再现,中央集权的王朝统治机构衰落的趋势;外来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渗透将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新体系之中,并沦为依附性的半殖民地;中国内部对外来入侵和没落封建专制的反抗,

其演变的顺序依次为传统形式和准传统形式如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向准现代形式和现代形式如自强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等过渡；内部新兴民族主义勃起，出现经济增长、制度革新和文化革命，引起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适应现代工业世界的新的社会经济缓慢转换^[5]。但中国社会的这一演变是在外力推动和内部自发对抗的基础上缓慢转变的，社会的运行处于无序和混乱的状态，良性运行机制根本无从谈起。奠定正常社会运行的当务之争是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主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威胁下被动开启的，同时又挟裹着传统社会周期性治乱循环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因素，外来以掠夺利益为核心的入侵和内部无法承担保障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使命的亡命政权推动了社会的日益衰败。外来列强通过一系列侵华战争，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了种种特权，渗透到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一系列国家发展和变革的命脉，从中国攫取了大量的财富，控制了海关、金融体系等国民经济命脉，斩断了中国自主发展的后路，也斩断了人们生存与发展所依赖的基本保障，整个中国社会笼罩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之中。不进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中国永无出头之日，更无从谈起社会的良性运行。正如马克思在 1858 年的明确预言：尽管“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6]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的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分别粉墨登场，试图力挽狂澜，完成国家自强、民族独立或民主主义的目标，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进入到 20 世纪 20 年代，贫穷落后、支离破碎、危机重重的中国社会需要新的占支配地位的领导阶级和能被民众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内容，以整合社会现有的反抗力量和资源，对外完成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对内对旧的社会结构进行彻底改造的使命。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所依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此时已在中国大地有了广泛传播的基础，并被一些眼界开阔、有志于挽救民族危机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在俄国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代表着中国最广大工农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登上历史舞台。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辛亥革命胜利成果被窃取后，日益被以北洋军阀和北洋官僚为核心的政权边缘化，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共产党的参与下，孙中山重新诠释了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通过改组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提出“以俄为师”方针，最终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完成了全国政权的初步统一。

孙中山逝世后，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发生了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并在围绕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发生了分化，以胡汉民、戴季陶、蒋介石、汪精卫等为首与旧势力相妥协的国民党右派逐渐占据了上风，随后发动了一系列反革命军事政变残杀中国共产党及进步人士，中国社会步入社会运行正常轨道的脚步戛然而止。随后爆发的由不同列强支持的大规模新军阀混战，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地持续围剿，使得社会再次陷入动荡之中。特别是 1931 年，日本加强了对中国的入侵，使得国内危机在受到世界经济大危机、战乱滋扰等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处于崩溃的边缘。在国家实现初步统一的大好形势下，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应该有责任有义务承担起革命的重任，整合包括农民阶级、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等在内的社会各种资源，解

决国家面临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然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为一己之私,枉国家命运之不顾,将政权逐渐推向了军事化、官僚化和资产化,并最终将其执政理念固化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国民党党内充斥着投机分子、大资产阶级、大官僚等既得利益者,大量的有志青年和革命志士被清除,并寄希望于通过合作或妥协的方式将其无法掌控的地方政府和保守的土豪劣绅势力收编,以巩固其政权。蒋介石还在“以党治国”的美名下,竭力限制人民的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己,甚至全国性的抗议日本侵略者的群众运动,也力图被纳入国民党当局的掌握之中。中山先生一生为之奋斗和努力的“三民主义”被束之高阁。

任何政权的生存与发展,都必须依靠这个国度当中的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或阶层,这是人类历史发展亘古不变的规律。虽然中国近代的农民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且鲜有发言权,但毕竟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主义绝不能离开他们的支持,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但国民党政权在运行过程中,几乎是抛弃了这个群体,且做出了“谁掌握着城市,谁就掌握着中国”的错误判断,加上近代以来民主思想广泛传播并逐渐被民众所接受,日益成为进步和发展的价值标准和指导思想,个人独裁和专制已然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而诛之。所以,历史与人民最终抛弃了国民党,而选择了更了解中国国情,全心全意为解决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生活而努力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早期也曾犯过右倾和左倾错误,出现过退让与激进等意识,但其充分相信农民、依靠农民的革命原则从未放弃,高举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大旗从未倒下,尤其是1935年之后,随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时局判断的准确,党在理论认识到革命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体系,建立了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社会进步力量逐渐占据了社会的优势地位,并获得了广大人民的坚定支持,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中国长达110年的社会混乱与失序状态,为中国从此导入正常有序的社会运行机制开启了引擎。

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了许多社会良性运行的理论与政策,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运行架构提出了创新性的分析,尤其是自1927年开辟革命根据地开始,其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都进行过社会良性运行的探索与实践,只是这种探索带有试验性和战时特殊性。经济上实施了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三大经济政策”,适当发展了工业、对外贸易和合作社,并建立了金融体系和财税政策,为在经济封锁状态下的生产自救和革命推进奠定了经济基础;政治上则在不同时期提出工农民主、三三制、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等政权建设思想,为在不同时期依靠工农、联合社会进步力量推进革命进展提供了政治保障,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促进了社会的转型;文化上则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党的理论、国情教育等为主,将现代性、民族性和大众性教育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精神支柱;社会领域,中国共产党着眼于工农的恶劣生存环境,提出了众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的思想和政策,如《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草案》中就提出,中国共产党“供给并改良都市平民之住宅,规定限制房租的法律”、“制定强迫的劳动保险法”、“救济失业工人”等,对于社会保障的对象、内容、方式、途径等都有涉及,并在实践中以社会革命的方式予以实现。单纯从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的角度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探索可能是低层次和不系统的,但如果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扩大中国共

产党的影响、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主义的角度分析,无疑中国共产党对当时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所构建的社会运行系统是良性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首要是完成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使命,实现了国家统一,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从此之后具备了独立发展的权利和能力;结束了中国社会长期动荡无序的状态,解放了国内各阶级长期以来所遭受的压迫,赋予了人们基本的人权保障,完成了社会阶级及各种资源的全面整合,为中国开启新的发展模式和社会运行积蓄了资源。摆脱了中国现代化“外部刺激—被动适应—依附发展”的旧模式,排除了中国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系统的根本性障碍,开始了新时代自主的社会运行探索与构建。赋予了中国现代民主革命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意义,带来了现代民族观念,在把中国推同世界的同时,又构建、撷取了人类文明精华的开放的新价值体系的助力与基石,从而为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培育和提供了崭新的价值资源与精神动力。

(二) 艰难探索: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开启了社会正常运行序幕,为中国建构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系统积累了经验与教训

毛泽东深谙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亘古不变的历史周期律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和解读。为防止中国共产党重蹈覆辙,早在1944年,毛泽东即将郭沫若分析李自成政权覆灭的《甲申三百年祭》印发党内,给党敲警钟。后来在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问题时,毛泽东给的答案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7]建国之前,毛泽东再次重申,“进城赶考去,我们决不做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8]并且为使党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预防腐败,毛泽东要求干部要做到“两个务必”。

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将中国从旧中国几近崩溃的社会体系中进行了重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效仿苏联模式的构建与改革,这种构建与改革带有强烈的模仿、国家权力推行、计划和政治中心的特点。“新社会是国家权力高度扩张、强国家弱社会或者可以说是国家社会高度一体化的社会;新社会是社会成员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新社会是社会生活以平等化为取向的社会;新社会是社会生活诸方面表现为浓厚的政治化倾向的社会。”^[9]但其最终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与转变,并初步构建了我国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政治体系,人们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为把我国导入正常有序的良性社会奠定了基础。

其实自建国后,尤其是1957年反右倾运动扩大化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思维一直困囿于保持党的纯洁性、反对官僚主义和治理腐败问题,为此毛泽东主导进行了多次的整党整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群众运动。主要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采取的是自下而上外围监督与揭发及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措施,以防止党退化成一个保守的、因循守旧的官僚机构。但这些措施仍然无法解决毛泽东所认为的担忧,其又发动了寄希望于打乱秩序进行重建的“文化大革命”。“由于毛泽东采用的方式缺乏法律规范的约束,导致技术上的不可控性。在打击官僚主义的过程中,亦松散了维持社会秩序基础的行政机构的严密性,致使官僚机构的权力流失,

正常行政秩序的混乱。同时,亦导致群众无政府主义的倾向。群众在反官僚主义过程中,由于没有法律的规范与约束,变成了混乱的、非理性的‘情绪性民主’的无政府状态。同时,中共执政载体的数量与质量的缺失导致其执政能力与控制社会的能力下降。”^[10]应当说,毛泽东发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主义运行过程中的弊端,试图避开并超越斯大林模式,建立一个又快又好,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模式,但在采取的方式方法上,犯了经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错误,他所推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使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严重失衡,采取的大民主政治推进方式最终酿成了社会的恶性运行,经济发展沦为了阶级斗争的附属品,社会的正常运行被中断。

从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系统构建的角度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此时期所遭受的挫折又情有可因。一是不具备对外开放的时机,社会在自我封闭中运行。建国后,我国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只能选择社会主义阵营。中苏交恶后,中国可供选择的对外国家变得更加稀少,在这种现实条件下,中国只能依靠自力更生,无法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也因此错过了世界现代化第二次浪潮。二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具有难以超越的弊端。我国的社会主义模式虽然提出要以苏为鉴,但内核的运行基本上是一致的,传统社会主义所强调的一大二公、计划经济我国都一一应验,企业和公民是国家建设的服从者和执行者,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力,加之人为设置户口壁垒,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社会流动缓慢且通道狭窄。三是重工业至上模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基于对工业化等于现代化的认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基本上围绕着重工业化道路开展,生产与消费严重失衡,最终导致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严重失调,社会保障体系处于相当低的水平运行,最终只能依靠政治命令的方式推进,社会运行缺乏最基本的经济利益因素介入。四是长期阶级斗争酿成的恶果。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干部到普通民众,长期处于阶级斗争、政治运动 and 大规模思想批判之中,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社会运行的建议通道被关闭,人人自危、社会秩序动乱的时代条件下,人们已经缺乏对社会的总体宏观观察与分析。五是中央集权与个人崇拜的盛行。由于民主集中制和民主决策机制执行不到位,领袖的错误倾向与言论无法得到及时纠正,反而是在从众心理的支配下迅速贯彻实施,最终导致了经济建设中心的偏离,社会的其他方面如教育、科学、社会保障、生态等均受到了波及。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此时期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形成了一批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如中共八大所作出的决策、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解决了中国国家安全的根本问题,消除了外来的威胁因素;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化体系,解决了中国工业化“从无到有”的问题,从而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新进入良性社会运行系统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三)有序导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逐步探索出了社会运行的规律,为中国建构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系统铺设了轨迹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良性运行的大幕。中国共产党在系统总结过去历史经验教训和结合世界现代化进程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深入分析了中国国情和世情,形成了一大批反映中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理论成果，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色和内在规律，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修正、优化，中国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系统得到了基本构建。

1. 民众基本生存生活条件逐步改善，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系统基础巩固

民众基本的生存和温饱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和社会良性运行的首要前提，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足点。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社会不稳定并经常出现失序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粮食短缺和民众的生存危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上来，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的改革起步，将三农问题置于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对待，不断提升农业科技、资金和人才的支持力度，并于2006年全面废除了农业税，确保了18亿亩耕地的红线，逐步解除了束缚在农民身上的各种障碍。新时期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为农村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中国用有限的土地养活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解决了一直以来困惑中国社会运行的粮食问题，对于宏观层面制订社会发展政策和进行改革，引导民众建立合理、有序、高效的社会运行系统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同时，中国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平衡了生产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缓冲了人口臃肿给社会运行所带来的巨大压力。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保持着高速度和稳定性，经济总量逐年攀升，民众生存状态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从而为中国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 全面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系统充满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保持中央权威和全国全盘统筹的基础上，逐渐从传统社会主义僵化、固定的体制机制中解放出来，放权让利于地方、企事业单位与民众，逐步构建了围绕社会良性运行的体制机制体系，调动了民众的劳动和参与社会的积极性，激发出了社会系统的活力。经济上逐步建立并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和国家间接宏观调控充分结合，使经济发展迸发出了活力。政治上进行的多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服务型政府，实现了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转变。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地方自治、基层民主自治、政治协商制度等体制进行了深化改革，推进了党内民主、社会民主和协商民主，提高了民主党派和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水平。机制建设上，经过调整和变革，逐步形成先进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政策决策机制、依法运行机制、民情民意表达机制、人口流动畅通机制、社会管理机制等等，为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合理的资源配置和良性的社会结构奠定了基础。现代社会良性运行需要科学的体制机制的保障，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体制机制构建与改革，正是打破了旧有的社会平衡结构，协调好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人民可承受能力之间的关系，建构了充满活力的耗散结构，从而保证了中国社会向有序系统的演化。

3. 意识形态主流价值形成，现代社会良性运行规范稳定

人类社会的实践表明，一个社会要获得良性运行，其社会运行机制就在于社会能通过社会化过程，确保世代相续的社会成员对社会主导思想和主导规范的认同与遵循，并确认这些

思想与规范的正确性。同时,将其内化为个体用以自律的角色心理定势,并在社会互动过程中通过一致的理论指导、制度保证和行为控制予以实行,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导规范转化为现实的社会感性存在。这一良性社会运行机制的根本奥秘就在于社会主体在理论定向、政策导向和操作取向之间达到高度的统一以及个体和社会之间的正常融合^[1]。中国共产党延续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形成了内涵丰富、外延拓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等成果,并通过自上而下的理论学习和宣传贯彻,利用各种载体将党的最新理论、方针、政策传达到社会成员之中。高度重视国民的意识形态教育,逐步建立起了意识形态教育体系,提升了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系统的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教育,在社会上形成了核心价值理念的引导,增强了民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可度、凝聚力和向心力,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子系统发展形成了协同的关系,为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价值导向。

4. 建构了开放的社会系统,现代社会良性运行自由畅通

耗散结构论认为,事物的有序结构存在于开放系统中,开放是产生耗散结构的必要条件,在封闭系统中不可能形成新的有序结构,而且开放后必须从外界引入负熵流,如果不是负熵流,那就只能加速系统向无序化发展^[2]。改革开放后,中国主动地从封闭的社会系统走出来,确定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再到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充分利用后发国家发展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融入到了世界的发展大潮中。中国利用开放的时机,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华丽转身,一跃成为世界经济贸易大国,社会系统也逐渐形成了市场、资源、能量、信息和技术等自由流通的开放系统。

5. 建构了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理论,现代社会良性运行持续有序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国情,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建设理论,并不断在理论上深化,在实践中调适,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构建现代良性社会运行系统的思想基本成熟。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核心立场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精神实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积累的矛盾、冲突及失衡提出了修正性的指导原则,整合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构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科学发展观是对系统理论和方法的崇尚与诠释,是对传统人统治自然思想的扬弃和重新解读,揭示了现代中国社会良性运行的方向。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构建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是确保社会人际关系、资源配置和社会结构的有效流通和匹配建构。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度出现唯经济增长至上的趋势,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和民生出现了较大的问题,影响到了社会稳定。随着国家财力地不断增长,我国逐渐将视野转向了社会领域,围绕着“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意愿和目标,制订了一系列政策,并利用财政、税收、保障、福利和救助等工具进行社会整合和社会调节,如确保了教育投入占 GDP 的 4%、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投入、扩大社会救助安抚的规

模与区域等等。

6. 党的执政能力稳步提高,现代社会良性运行保障有力

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的自组织运行和协调运转,离不开执政党的科学执政和党组织建设。对于中国这种超大型的复杂社会系统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过渡和转型,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自身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全面推进了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纪律建设,切实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得到了巨大提升,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从而为中国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行提供了坚实的领导保障。

三、当代中国社会良性运行系统全面构建的困境与思考

当代中国社会的运行已完全超越了传统社会的历史周期律,其良性运行所具有的意蕴是针对中国社会全面转型之后向更高阶段发展要呈现的概貌,它既不是意味着单纯某一领域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现代化,也不是某一区域的社会发展,而强调的是社会系统及内部的各子系统之间共生相谐、包容整合,强调的是系统内外的整体性、开放性、有序性和协调性。基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我们无法去模仿或借鉴现成的社会良性运行模式,只有用系统思维、整体思维去再次探索影响中国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的缺陷与危机性因素,用持续变动的行为去适应持续变动的社会系统。而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当代中国社会继续沿良性运行的轨迹前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长期在探索过程中所建构的社会运行机制也积累了很多的矛盾和冲突,这些影响良性运行的因素如不加以消泯,势必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行。从社会运行系统的宏观视角看,主要表现为系统外部的环境风险和系统内部的边际风险。

(一)确立远离平衡思维,逐步化解外部环境风险

耗散结构论认为,系统在保持开放的状态下,通过物质和能量与外部的交换,输入负熵,克服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混乱,以维持结构平衡。系统的远离平衡可以促进系统向有秩序、有组织、多功能的方向进化。但这种远离平衡,必须要保证外部要素在输入系统内时,不对系统产生过强或毁灭性的打击,否则会引起系统的崩溃。中国社会的运行目前基本上处于一种远离平衡的状态,但所面临的来自国际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压力逐渐显现出累积性效应,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性。

1. 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制定有利于社会良性运行的国际战略

当今世界是一个政治多极性和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国在融入这样的格局并逐渐占有一席之地的时候,亦面临着诸多的风险。一是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但发达国家近年来的经济低迷给中国出口的持续扩张带来了巨大压力,中国出口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止2014年,中国连续18年成为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二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为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带来更大的风险,汇率风险、信贷风险、投资风险都较以前增大;三是中国的快速崛起,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

国家的担忧,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从各方面试图遏制中国发展;四是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周边环境,主要表现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的领土、领海争议及周边地区性冲突。中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和所面临的高风险外部环境,是当代中国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障碍。而要化解这些风险,我国要切实将转变发展方式落到实处,不断扩大内需和进行结构调整;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施包容性发展和平等互利的对外贸易原则;在坚持和平崛起方针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参加国际事务的协调,履行国际义务,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全面深化国防现代化和军队改革,并注意协调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不断提升我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从而为中国社会良性运行赢得有利的外部环境。

2. 树立持续的发展理念,创造有利于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的可再生环境

当前中国社会良性运行的最根本制约因素是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在 GDP 至上和官员政绩导向的双重作用下,经济发展对资源开发利用的规模和各行业污染排放量也随之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即是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生态环境问题呈几何数增长,自然环境的可承受能力变得越来越脆弱,并给民众的社会生活带来了诸多困扰,最终影响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环境质量的衰退和环境系统的功能失调,不仅从社会系统外部来看日益威胁到社会良性运行的物质基础,而且引发了社会系统内部的摩擦和冲突。近 10 年来,我国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造成了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群众来信或上访的数量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也会对社会和谐构成现实的威胁。”^[13]而要解决这一制约因素,就要推进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将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建立和完善环境成本内部化机制,利用适当的价格机制来引导资源的合理消费和保护,加大对环境破坏的执法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加大政府对环保的介入力度,增加公共财政支出和创新体制机制,加强环境宣传和教育,唤醒社会成员的环保意识,从而为民众提供优良的自然环境公共产品。

(二)建构非线性思维,逐步摆脱社会良性运行的内部边际风险

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是解决社会结构失衡,确保社会运行有序的保障。而这种非线性作用的发挥,必需由中国共产党做好顶层设计和解决危及社会良性运行要素的基础上实现。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底提出的“四个全面”从社会运行的视角看,其实就是解决我国当前内部边际风险的最大顶层安排,也是中国社会良性运行的战略路线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到 2020 年我国要实现的宏观目标,是社会螺旋式上升的阶段性目标,也是实现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稳定社会、有序社会的根基。“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破除阻碍社会良性运行的体制机制弊端,分解既得利益集团对社会运行公平正义的威胁,实现利益向民众倾斜的重新分配。“全面依法治国”则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必要之义,是要重新确立法治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权威作用,确保社会运行之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要素都走在法治的轨道上,以保证法治成为执政党的基本理念、体制机制实施的基本场域和民众崇尚的精神信仰。“全面从严治党”是保证中国共产党主导中国社会运行的根本保障,是重塑具有崇高信仰、管理严格、执行力强的政党的时代要求,更是保证中国持续提升社会运行质量的重要因素。

1. 解决权力失衡问题,构建有利于社会良性运行的政治机制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上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政治的实际运行呈线性关系,权力的运行缺乏严格的制约和监督,封建专制思想中官本位文化仍大有市场,权力滥用、以权谋私、以权压法等频繁发生,对社会良性运行产生了恶劣影响。从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态势看,权力失衡依然十分严峻。为强化权力制约与监督,解决公权力的规范使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出了明确答案:“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14]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权力制约与监督还只是宏观的政策导向,还需要在实施过程中建构具体的系列配套制度并保证其运转高效,从而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权力的制衡和为民服务本质。

2. 解决道德失范问题,构建有利于社会良性运行的思想体系

道德在发挥自身能动的社会调控功能时,不是采取强制方式,而是作为人们行为与社会运转的调节器,统一社会的意志和行为,强化理想信念,协调社会秩序,规范社会行为,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与目标选择,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良性循环^[15]。我国目前正处于巨大的社会转型时期,受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滞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观念等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享乐主义、诚信缺失、社会公德危机等道德衰落现象,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良性运行。要解决道德失范问题,就要大力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践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基本道德规范教育,构建与当代社会良性运行相符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教育方式,从基础教育着手,逐步构建起覆盖全民的公民素质教育体系;突破现有的基本道德规范限制,树立世界视野的国民素质要求,将国民塑造成既适应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时代要求,又能够体现个人崇高道德追求的现代公民。

3. 解决群体事件频发问题,建立有利于社会良性运行的预控机制

我国社会转型正面临着关键的临界点,正处于矛盾多发期和社会失调期,社会系统内的任何不协调因素而产生的矛盾、冲突或人们的无序互动都可能导致民众出现紧张情绪或围观状态,当这种社会张力逐步积聚,就会对社会系统产生巨大的冲击波,并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释放出来,从而导致社会风险或区域性失序。中国社科院 2013 年中国社会蓝皮书汇总,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且主要集中于征地拆迁、劳资关系和环境保护领域,这对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要逐步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不断健全社会的预警和应急体系,规范新闻媒体的客观报道与分析外,还要减少行政命令式的高压手段,畅通社情民意的反映渠道和机制,如听证、公示、信访等制度,保证民众的选择权、知情权、参与权,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解决引起群体性事件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以权代法、官商勾结等问题。

4. 解决社会治理问题,树立有利于社会良性运行的规则与人性意识

社会治理的使命是合理有序地安排参与社会主体的适应性和适当地社会行为,预防与削

减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以维持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和谐,为执政党执政和社会良性运行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治理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元、从控权到放权的演变历程,这是基于中国社会结构变动、人口流动、利益诉求多元等现实变化所作出的应对。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在社会治理给予了高度关注,对社会治理的格局、理念、体制机制创新、治理能力等方面出台了宏观的政策和指导性意见,基本保障了中国社会处于运行通畅、风险可控的范围之内。但社会治理领域很多长期存在和积累的矛盾与冲突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其体现在城乡差别、教育、养老、医疗、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诸多领域,且很多是由于历史或人为因素造成的强制性措施与刚性壁垒,这都是影响中国社会良性运行的潜在危险性要素。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为中国社会治理的转型及升级奠定了基调和预设了方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应然要素,它的现代化进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既要保持同步性,还要树立符合社会运行规律的规则与人性意识,这是基于社会治理与民众利益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性,规则意识是保障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建构能够被遵循和执行,人性意识是保障社会治理有处理问题的柔性措施、变通性和非强制性,以协调、平和的方式对待公众的各种利益诉求。

四、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四个时期的发展实践表明,其一直在为中国跳出传统社会周期更替的规律,将中国导入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系统,最终实现民族独立、政权稳定、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目标而努力。但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系统是一个长期而艰辛的过程,既需要理论认识上的不断深化和实践探索中不断修正,也需要具体社会运行机制上的不断改革与完善。所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已经在这条道路上逐步建构了正确的理论,并在实践中逐一的推行、调整、完善,从而为我国全面构建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系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对中国共产党对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系统探索与实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还处于粗线条的总结与提炼,所阐述的观点可能还只是浅层次的,还只是抛砖引玉。要真正从社会运行的视角将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探索与矢志不移的推行研究清楚,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这其中所涉及到的内容还比较庞杂,如中国共产党对社会运行探索的规律性是什么,中国共产党在建构社会良性运行中的理论自觉是如何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运行之中起主导作用动员能力如何获取,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区域性试验与当代中国社会运行的比较,中国共产党如何解决当代中国社会良性运行的障碍与风险等等,都需要学者同仁共同关注。

参考文献:

- [1]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6-7.
- [2] T.Parsons.The Social System[M]. New York: Free Press,1951:54.
- [3] 沈大德,吴廷嘉.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探析[J].社会科学研究,1992,(1):77-82.
- [4]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43.

- [5]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97.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26.
- [7] 黄炎培.八十年来附延安归来[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156-157.
- [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
- [9] 皮学军.新视角,新国史:读变迁与重建——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5):71-72.
- [10] 李守可.毛泽东的官僚政治认知困境及其启示[J].唯实,2007,(6):25-28.
- [11] 郑伟建.我国社会运行机制的现状、认识、反思[J].浙江学刊,1991,(6):81-84.
- [12] 齐城.社会系统有序发展的结构及演化动力分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17-20.
- [13] 郑杭生.环境—社会关系与社会运行论[J].甘肃社会科学,2007,(1): 5-7.
- [14]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
- [15] 王继明.试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系统运行的控制机制[J].系统科学学报,2008,(3):24-28.

责任编辑:陈于后

China Communist Party'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Building Benign Operation System of the Society

LI Shouke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Nantong Shipping College, Nantong 226010, China)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of theory, practice and methods to review the entir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benign operation. The new ideas and new areas of CPC history study can be derived from it. The runn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in a closed system led to the periodic cycle of turbulent history. The social order demonstrated a single alternative social law between stability and chaos. The formation of this law has its profound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roots and is the result of the social system closeness, social structure fixture, the limited development space of new heterogeneity factor and shackle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However, to break the law, Chinese people must build a modern society benign operation system. In the 90 years' development practic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performed arduous exploration to get out of the periodic law 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build a healthy social operation system. The exploration has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early or late, i.e. early exploration, primary building, adjustment and reform. The CPC unceasingly deepens the theory and implements correction in practice. Although in the process, it experienced all sort of twists and turns, lessons and deviation, 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ongress, the CPC gradually builds up a benign social operation system complying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demand of Chinese people and the main obstacles for social benign operation have been solved. At present, the CPC has gone beyond the traditional social cycle curse and put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into a benign orbi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and CPC needs to follow the social rules,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and exp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really put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governance with the law and the "four overall" into practice. The CPC should both focus on social benign operation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risk caused by the medium elements and microelements influencing the social benign running, and continue building the Chinese social benign operation, steady development, stability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social operation; benign social operation; social governance; social system